

元初的東平學風及影響

范洋達*

摘要

金末蒙興之際，中國北方正陷入空前的大混亂，政局動盪不安，人民生活顛沛流離。當時，投靠強而有勢的霸主，發揮所長，為大多數士人生存的主要管道，因此各地游士之風盛行。這些收容士人的霸主，為當時華北雄據一方的漢軍世侯，他們於蒙古南侵時以襄贊之功，獲得蒙古統治者信賴，成為鎮戍地方的軍事力量之一。其中，東平嚴氏雖以武功起家，屬於蒙古漢軍世侯之一，卻重視文教學風，在金末蒙興之際積極培養人才，招攬儒士，重教崇儒，延續中原文化。

東平嚴氏在保存文化，振興學術的舉措，使得東平逐漸成為當時華北地區的學術重鎮。元初，東平出身的士人逐漸在政治上展露頭角，獲得朝廷重用，發展出一個屬性相似的團體；另外，東平士人在學術上亦凝聚為一股勢力，形成所謂的東平學派。

關鍵詞：元代、教育、學校、學術、嚴實、漢軍世侯、東平

*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西元十三世紀初，蒙古南侵，金廷無力抵抗，華北政局動盪不安，自金哀宗（1223-1234在位）正大七年（1230）舉行最後一次科舉後，華北地區遂無科舉之行，¹使得士人無法利用科舉考試進入官府任職，生活顛沛流離，經濟陷入困頓。²因此，投靠強而有勢的霸主，發揮所長，為此時士人生存的唯一管道，游士之風遂盛行。從另一個角度言，在當時社會動亂的情況下，士人得以找到棲身之所，生活無虞，甚至相互交流，形成一個文化圈，背後的支持者，當然不可以忽視。這些在背後支持士風的力量，就是以軍事武功起家的漢軍世侯。

蒙古能陸續征服金、夏、南宋，進而統一中國，立國建元，華北的漢軍世侯襄助，是重要的關鍵之一。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在位）定鼎中國後，這些漢軍將領成為新興的權貴，享有特權與世襲侯爵等殊榮。東平嚴氏是元初六大漢軍世侯之一³，蒙古南侵時以襄贊之功，獲得朝廷信賴，成為鎮戍地方的軍事力量。然而，嚴氏以武功起家，卻重視文教學風，在金末蒙興之際積極培養人才，延續中原文化，突顯東平嚴氏在政治上的特殊性，與文化上的重要性。

東平嚴氏發跡於嚴實（字武叔，1182-1240），史載為泰安長清（今山東濟南）人，屬地方豪強之流。金宣宗（1213-1223在位）貞祐二年（1214，宋寧宗嘉定七年，元太祖九年），金廷因無法抵禦蒙古進犯，將國都由中都（今北京）南遷至南京（今河南開封），棄守北方，使河北、山西、山東等地呈現無政府狀態，社會秩序大亂，嚴實於此時利用自身勢力，於山東境內組織軍隊，培養勢力，逐漸成為

¹ 關於金代科舉的規定、施行、錄取人數等問題，可以參見薛瑞兆，《金代科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或徐秉愉，〈金代女真進士科制度的建立及其對女真政權的影響〉，收入《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台北，2004），頁97-132。自金哀宗正大七年（1230）行科舉迄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復行科舉止，八十四年之間，華北地區並無科舉的施行紀錄。

² 袁冀，〈金元之際江北之人民生活〉，《元史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6），頁44-68。

³ 元初的漢軍世侯，分別有天成劉氏、真定史氏、保定張氏、東平嚴氏、濟南張氏、棗城董氏與益都李氏等。其中，益都李壇（李全子）於中統三年（1262）四月叛，旋遭弭平。其餘的漢軍世侯，因此事件後，權力陸續為朝廷限縮，甚至裁撤。詳見蕭啟慶師，〈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元代統治菁英研究之二〉，《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1994），頁265-348。

一方之霸。興定元年（1217，宋寧宗嘉定十年，元太祖十二年），蒙古再度發動大規模南侵，嚴實見蒙古勢不可擋，遂於興定四年（1220，宋寧宗嘉定十三年，元太祖十五年）以所佔領地「挈所部彰德、大名、磁、洛、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來歸」⁴，投靠蒙古，隔年（1221）獲封為東平（今山東東平）行尚書臺事（簡稱東平行臺，以下俱同）。⁵嚴實任東平行臺時，一方面「闢田野，完保聚，……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俗」⁶，以安定東平；另一方面，逐漸擴充自己的軍事實力，維持政治上的優勢；與此同時，又大力推行儒學教育，創置東平幕府，接納各地游士，振興東平的學風。

元太宗窩闊台汗十二年（1240，宋理宗嘉熙四年）嚴實死後，子嚴忠濟（？-1293）繼為嗣侯，並繼續推行嚴實的各项政策，創建東平府學為最大功績。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宋理宗景定二年）五月，朝廷以嚴忠濟「強橫難制」、「裘馬相尚，宴飲無度」為由，撤其藩侯名號，由弟嚴忠範繼之。⁷此後，嚴氏在東平的勢力，逐漸受到朝廷壓制，最後裁撤。但是，嚴氏父子任內培植的士人與學術文化，仍為朝廷重用與重視，於日後元初的政治與文化得以發揮影響力。

東平經過嚴氏父子三、四十年的經營，成為蒙元（大蒙古國1206-1259，元1260-1368）時文風鼎盛的地區之一。元初重要的名士之中，如元好問（1190-1257）、宋子貞（1185-1266）、商挺（1209-1288）、王磐（1202-1294）、李昶（1202-1289）、李謙（1231-1310）、徐世隆（1205-1285）等，都曾在嚴實的東平行臺或府學供職。何以武功起家的嚴氏要大力保存文化及招募游士？東平學風有何特色，對元代的士風，影響多大？最後，元初的東平士人，在政治或文化上，是否有相互影響的特質？上述問題，都是本文欲探討的重點。又，本文對於東平

⁴ 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點校本），卷148，〈嚴實傳〉，頁3505。

⁵ 大蒙古國時期，政制未定，故漢地政制大致沿襲金。金制，尚書省為中央最高行政機構，行尚書省事，簡稱行臺，係尚書省的外任代表，地位等同尚書省，掌握一地的軍政大權。嚴實所任東平行臺，即承襲金制。

⁶ 金·元好問，《遺山集》，收入《叢書集成三編》（台北：新文豐出版，1996）第38冊，卷26，〈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有序〉，頁5上-7上。

⁷ 嚴忠濟（？-1293），一名忠翰，字紫芝，嚴實次子。窩闊台汗十二年（1240），襲父爵為東平路行軍萬戶長官。中統二年（1261），朝廷以嚴忠濟「強橫難制」，解除其職，以弟嚴忠範代之。至元三十年（1293），卒，諡號莊孝。詳見元·姚燧，《牧庵集》，收入《四部叢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15，〈姚文獻公神道碑〉，頁134；及明·宋濂，《元史》，卷148，〈嚴忠濟傳〉，頁3507-3508。

士人的定義，係以嚴實父子招聘，或教學、受學於東平的士人為主。至於，雖籍於東平，與嚴氏無往來關係者，如王旭；⁸或曾遊歷東平的士人，如楊奐(1186-1255)⁹，都不在本文探討的範圍之內。

關於嚴氏父子與東平興學的論著，以往都偏重於嚴實父子的生平事蹟、東平士人的考證與人數多寡、東平學風興盛的情況等方面；至於，嚴實招募士人的過程，及東平學風在元代的發展與影響，則較少著墨，仍有發揮的空間。故，前述仍有研究空間的範疇，即是本文探討的重點。目前，學界就嚴氏父子與東平興學的論著，較重要的有孫克寬〈東平興學考〉一文，從史籍文獻中將東平行臺的重要人物，逐一疏理考證，藉由孫文可以得知東平行臺的人才興盛。然而，孫文對於東平士人的定義，不夠明確，致有許多史述，不盡確實，如孫氏將王文統（？-1262）納為東平士人之一，理由有二：其一，孫氏認為王文統係大定府人，地緣與東平接近；其二，孫氏從王文統與許衡（1209-1281）、竇默（1196-1280）等人之政策相異攻訐，認為王文統的思想淵源偏向東平。孫氏的立論，有其特別的觀點。¹⁰然，史載「王文統……落拓無所遇，獨李壇與語，大奇之，……賓置幕府」¹¹，可知王文統早年就投奔李壇（？-1262）麾下，為其獻策，與東平嚴實無明顯往來。

又，孫氏另著〈元初儒學之淵源〉一文，提及東平學派的士人以北人為主，魯齋學派的士人則以南人為多，雙方在政治、文化等歧見，都與地域之差異有關係，可謂南北儒生之分立¹²，如元明善（？-1322）¹³與虞集（1271-1348）¹⁴本為

⁸ 王旭，字景初，東平人，與王構、王磐以文章名於世，號稱三王，著有《蘭軒集》於世。關於王旭的生平，可以參見元·王旭，《蘭軒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02冊，1983），提要，頁727。

⁹ 楊奐（1186-1255），字煥然，乾州奉天（今陝西乾縣）人。金末，以教授為業。窩闊臺汗十年（1238），楊奐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授河南路收稅所官。忽必烈曾召至潛邸問策，授參議官。蒙哥汗五年（1255），卒，著有《還山遺稿》。史載「東平嚴實聞奐名，數問其行藏，奐終不一詣」（宋濂，《元史》，卷153，〈楊奐傳〉，頁3621）；然而，楊奐《還山遺稿·東遊記》則詳敘與東平士人及嚴實的往來，如「東平行臺公宴于東園，是日衣冠畢集」，上述內容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1988）第133冊，卷上，頁471。

¹⁰ 孫克寬，〈元初東平興學考〉，《元代漢文化之活動》（台北：中華書局，1968），頁109-138。

¹¹ 明·宋濂，《元史》，卷206，〈王文統傳〉，頁4594-4596。

¹² 孫克寬，〈元初儒學之淵源〉，《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台北：文星出版社，1958），頁139-198。

友，兩人任官後，為他人所構間，竟「復不能相下」。為此，御史中丞董士選（1253-1321）¹⁵從中斡旋，勸元明善曰：「復初（即元明善），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即虞集），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日為我飲酒，慎勿復如是也。」¹⁶就前述史實，筆者有數點淺見：首先，孫先生將元明善歸類為東平後學，卻沒有說明所據為何，筆者查據《儒林宗派》所述，係將元明善歸納於吳澄學派，性質應偏向魯齋學派。¹⁷其次，孫先生對於虞集與魯齋學派的關係為何，亦未說明。筆者認為，元、虞兩人的隔閡，係受人構間所致，並非在於理念、認知或學術之差異。換言之，孫文雖重於論證，當中卻有部分考證不周之處，值得重新檢視。

袁冀〈東平嚴實幕府人物與興學初考〉一文，分析東平府學的人物與貢獻，爬梳出幾個孫文未收納的東平士人，可補孫文之不足。然而，袁文對於一些東平士人之考證，並不詳實，有所遺漏，如張特立、張孔孫等人《元史》都有傳，而袁氏未能察得，亦未探究彼此的關係、往來等，是該文疏漏之處¹⁸，此亦值得重

¹³ 元明善（1269-1322），字復初，大名清河人（今河北清河）。初，得江西左丞董士選辟為掾。延祐二年（1315），曾短暫任參議中書省事，旋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至治元年（1321），授翰林學士。二年（1322），卒，諡文敏，著有《清河集》於世。關於元明善，《元史》有傳。

¹⁴ 虞集（1272-1348），字伯生，隆州仁壽（今四川仁壽）人，南宋右丞相虞允文（1110-1174）五世孫。初，得歐陽玄（1283-1357）舉薦，任翰林院編修官。泰定元年（1324），遷國子司業、國子祭酒。天曆初，除奎章閣侍讀學士。至正八年（1348），卒。著有《道園學古錄》、《道園類稿》。關於虞集，《元史》有傳。

¹⁵ 董士選（1253-1321），字舜卿，大名藁城人（今河北藁城），董俊（字用章，1186-1233）之孫，董文炳（1218-1278）次子，董士元（1235-1321）弟。董士選的家族顯赫，至元十三年（1276）隨父平南宋後，任江浙行省與江西行省左丞。大德元年（1297）後，累遷南臺中丞、御史中丞、江浙行省右丞、河南行省與陝西行省平章政事等職。至治元年（1321），卒，諡號忠宣。以上資料，引自王德毅，《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新文豐出版，1982）第三冊，頁1601。

¹⁶ 元·元明善，《清河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1988）第133冊，〈附錄〉，頁551。

¹⁷ 孫克寬先生係依元明善任職於翰林國史院，及出身於華北等因素，將元明善歸類為東平後學，詳見孫克寬，〈元初儒學之淵源〉，頁139-198。然而，《儒林宗派》依學術淵源將元明善歸為吳澄學派，則元明善的理念應趨向魯齋學派，而非東平學派。據清·萬斯同，《儒林宗派》，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1988）第15冊，卷13，〈元〉，頁3下-4上。又，據《元儒考略》述，元明善曾拜師於吳澄，遂得與虞集交游。明·馮從吾，《元儒考略》，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47冊，卷3，〈元明善傳〉，頁3上-3下。

¹⁸ 袁冀，〈東平嚴實幕府人物與興學初考〉，《元史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新檢視之處。

近年，蕭師啟慶〈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元代統治菁英研究之二〉一文，詳盡的探討大蒙古國時代至元代漢軍六大世侯家族的仕宦、婚姻問題。蕭師認為漢軍世侯的崛起，有其歷史背景。忽必烈之後，漢軍世家仍然備受禮遇，代代仕宦。至於，各漢軍世侯的貴顯與否，端視與蒙古汗廷親疏關係而定，這是蒙元時期特有的情況。¹⁹蕭師另著《Yen Shih》(中譯：〈嚴實傳〉)，探討嚴實崛起的原因與過程，包含創立東平幕府、振興東平文化、招募士人等過程，及嚴氏的仕宦與婚姻等情況。²⁰陳高華〈大蒙古國時期的東平嚴氏〉²¹一文，探討嚴實崛起的過程，如何藉由重定賦稅，穩定東平地區的社會經濟；東平嚴氏兩代振興學術、招募士人的過程；最後，探討嚴氏於入元後，家族的興衰情況。前述蕭師或陳高華之論著，對於嚴實各面向的頗析，都有詳盡且確實的論點，俱為本文參考的依據之一。

最後，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識份子和科舉〉一文，側重的重點有三：一為大蒙古國至元代，真定與東平等地文章派的特質與形成的原因；二為元初以許衡為首的德行派，在思想的淵源與政治的影響；最後論德行派與文章派的關係。²²簡言之，安部先生的主軸，在於元初文章派與德行派的學風，各有何特色，兩者的差異。不過，安部先生並未述及兩派的學風，在元代的發展情況及影響？孰盛孰衰？對於安部文未著墨之處，即為本文欲探討、補充的重心。

二、嚴氏招募士人的情況

嚴實於金宣宗興定四年（1220，宋寧宗嘉定十三年，元太祖十五年）入據東平後，因地處蒙、金、宋三國交界，大小地方勢力盤據，各方征戰不斷，嚴實為

1974)，頁 130-141。

¹⁹ 蕭啟慶師，〈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元代統治菁英研究之二〉，頁 265-348。

²⁰ C.C.Hsiao, "Yen Shih",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3), pp60-73。

²¹ 陳高華，〈大蒙古國時期的東平嚴氏〉，《元史論叢》，第六輯（1997），頁 1-23。

²² 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識份子和科舉〉，收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五卷，頁 636-679。

鞏固在東平的基礎，並未著重於文教興學，而是以軍事武功為重心，征討四方，以提高聲勢。嚴實逐漸關心文教，廣招士人，始於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宋理宗寶慶元年，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十年）平定彭義斌（?-1225）後，延攬彭氏部屬宋子貞於東平。²³嚴實以宋子貞任東平詳議官兼提舉學校事，負責籌建學校、招募各地士人；東平自此開啟興學、崇儒的時期。

宋子貞招募士人的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初期（嚴實時期，1220-1240）所引薦的士人，以金源遺士為主，如李世弼、李昶、張昉²⁴等人。這些士人中許多為前金進士，長期任官或任吏，雖於地方頗負名望，然聲名僅及於當地，非知名於各處，故未能得元好問等人的關注，而宋子貞卻能注意這些地方型的才士，並逐一引薦進入東平。這些士人入仕東平後，主要擔任東平行臺的幕官，參議各項政務。後期（嚴忠濟時期，1240-1261），因東平府學建成，宋子貞延攬許多學富五車、名享一方的學者，如康曄、王磐、張特立等人，擔任東平府學的教官，培養新興的東平士人。

東平招募士人之舉，除得力於宋子貞外，元好問之號召，亦有影響。金哀宗天興二年（1333，宋理宗紹定六年，元太宗窩闊臺汗五年），元好問於金亡前夕，上書時任大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1190-1243），信中開列當時華北著名的文士二十餘人，請求耶律楚材能予以照顧，使這些士人能免受戰亂之苦，以待未來之用。²⁵這封信是否送達耶律楚材，或為耶律楚材採納，今日已不得而知。然而，隨著元好問北依保定張柔、東平嚴實等漢軍世侯，該信所列舉的士人，逐漸為各漢軍世侯禮聘或招募。²⁶其中，元好問於窩闊臺汗八年（1236，宋理宗端平三年）隨趙天錫會嚴實後，即久居東平，²⁷時或出於元好問推薦，或嚴實主動招募，責成宋子貞禮聘商挺、徐世隆、杜仁傑、張澄（即張仲經）等士人至東平，或充任

²³ 宋子貞於金末亂時，北上投靠大名（今河北大名）彭義斌，任安撫司計議官。至彭氏為嚴實等將所敗，宋子貞率眾投靠嚴實，成為嚴氏幕僚。

²⁴ 張昉原為吏部令史，金亡後返歸鄉里東平。筆者以為，以張昉在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並非元好問、楊奐等知名文士，故能進入東平幕府，應得力於宋子貞等人推薦。

²⁵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39，〈寄中書耶律公書〉，頁1上-2下。

²⁶ 元好問信中所列舉的士人之中，如王鶚等人為保定張柔招募；李冶、魏璠等人為藁城董氏招募；楊果等人為真定史氏招募。然而，這些士人仍以東平嚴氏招募的人數為最。

²⁷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34，〈東游畧記〉，頁11上-13下。當時，嚴實為禮賢下士，聘請元好問久居東平。嚴實於閒暇之餘，會陪同元好問游，如泛舟等活動，增進友誼。詳見金·元好問，《遺山集》，卷10，〈約嚴侯泛舟〉，頁14上。

東平行臺的幕僚，或聘為諸子的教師，或協助學校教務，如張澄即「待以師賓之禮，授館於長清之別墅。」²⁸為此，元好問就盛讚嚴實「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²⁹顯見嚴實招募士人的動作，最為積極。簡言之，上述士人可視為最早的東平士人，他們將金源文化引進東平，豐富東平的文化，奠定東平的學術地位，開創新興的東平學風，培養新興的東平士人。

筆者以為，嚴實父子大力興學，招募四方士人，崇尚儒學之風氣，有一定政治、社會、文化、地理上的背景考量。就政治而言，當時華北大亂，各方割據勢力相互競逐，擴大地盤，嚴實藉由培養士風，厚植自己在政治、社會上的聲望，³⁰為立足山東取得合法性與正當性，進而壯大自己的勢力；就社會而言，當時正逢戰亂，許多士人顛沛流離，且動亂造成社會動盪不安，妥善照顧士人，成為穩定社會的首要之務；就文化與地理而言，山東，為孔、孟、顏氏子孫世居之地，學術與文化厚植，自先秦以來就是儒學之重鎮。這種崇儒的風氣，瀰漫山東全境，不因政治的紛擾、戰亂的頻繁有所改變，出生於山東的嚴實，多少受此風氣影響，養成愛好文藝，奉守儒家精神的個性。元好問即言，嚴實崇尚節儉，「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時化之。上而偏裨參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公之威而効功之儉」³¹，為人民所敬重。又，據蘇天爵（1294-1352）所言，嚴實治理下的東平，「行於野則知其為樂歲，出于塗則知其為善俗，觀于政則知其為太平官府。」³²蘇氏或許言過其實，溢美之詞多於實情，美化了嚴實的治蹟，仍可反映當時東平境內某種程度上的實情。³³

此外，嚴實為諸子³⁴聘請著名儒士，如元好問、商挺、張澄、李楨等士人為

²⁸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37，〈張仲經詩集序〉，頁1上-2下。

²⁹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23，〈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頁1上-5下。

³⁰ 韓志遠，〈元好問在金元之際的政治活動〉，《元史論叢》，第五輯（1994），頁282-294。

³¹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30，〈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并引〉，頁12上-14上。關於當時東平的稅賦額度、徵收方式等，對人民所造成的負擔是否沉重，可以參見陳高華，〈大蒙古國時期的東平嚴氏〉，頁1-23。

³²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華書局，1996，點校本），卷6，〈萬戶嚴武惠公傳〉，頁93。

³³ 當時，各漢軍世侯必須負責徵稅，百姓的負擔極重。因此，嚴實治理下的東平人民，要生活安康富裕，似乎不太可能。但，生活較其他地區安定，比較貼近實情。

³⁴ 嚴實有子七人，分別為忠貞、忠濟（?-1293）、忠嗣（?-1273）、忠範（?-1275）、忠傑、忠裕與忠祐等七人。詳見《元史·嚴實傳》。

家庭教師，教授儒學經典，元好問即讚曰：「(嚴實)諸郎玉石秀發，生長見聞，宜有不資於人而自嫩(音「美」，意同)者。正〔武〕叔(即嚴實)年甫六十，安閒樂易，福祿方來。他日，羔雁成羣，極人間盛事。」³⁵強調嚴實諸子，都飽讀經書，宛如名士。

事實上，嚴實諸子的受教程度、影響有別，如嗣侯嚴忠濟，娶衍聖公孔元措之女為妻³⁶，撰有小令二首³⁷存於世，儒學造詣頗高；政績有創建東平府學，親率諸生著禮服行禮，令宋子貞廣聘儒士任教等舉措，展現儒學素養，為人所稱。然，史載嚴忠濟「力能生殺人」³⁸，施政則「強橫難制」、「裘馬相尚，宴飲無度」，怠於政事，生活豪華，行事作為，盡失儒學風範，有士人難掩失望之情，如李昶因勸諫忠濟無效，遂離去。³⁹忠濟弟忠傑⁴⁰，據李治(1177-1265)言：「有文如《淇澳》⁴¹，好善如《干旄》⁴²。」⁴³又，徐世隆(1205-1285)言：「東平嚴侯弟忠傑，喜與士人游。」⁴⁴又，王鶚(1189-1273)言：「東平嚴侯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尤其敬重元好問，在元好問死後，重金「即其家購求遺稿，捐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⁴⁵是嚴實諸子中，少數深受儒學薰陶者。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³⁵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39，〈曹南商氏千秋錄〉，頁9上-14下。

³⁶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32，〈東平府新學記〉，頁3上-6下。

³⁷ 嚴忠濟撰有《天淨沙》、《壽陽曲》等小令二首存世，詳見隋樹森，《全元散曲》(台北：漢京出版，1983，據四部刊要本)，〈嚴忠濟〉，頁70-71。

³⁸ 元·姚燧，《牧庵集》，卷25，〈孝子梁公神道碣〉，頁237-239。

³⁹ 嚴忠濟治理東平時，因生活鋪張，且“怠於政事”，使東平的經濟狀況日漸惡化，人民生活日趨痛苦，李昶曾為此諫言嚴忠濟，卻未得善意回應，遂辭離東平。詳見明·宋濂，《元史》，卷160，〈李昶傳〉，頁3762。

⁴⁰ 嚴忠傑，係嚴實第五子，曾繼忠濟、忠範後，襲封東平管軍萬戶。至元十四年(1277)，遷鎮江路(今江蘇鎮江)達魯花赤，終浙東道宣慰使。元·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台北：成文出版，1975)，卷15，〈刺守〉，頁830-831。

⁴¹ 《淇澳》，為《詩經·衛風》的篇名之一，寓意為稱頌一個人的文章優美，能以禮自防。

⁴² 《干旄》，為《詩經·鄘風》的篇名之一，寓意為讚美一個人的言行有善道。

⁴³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首，〈李治序〉，頁3上-4上。

⁴⁴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首，〈徐世隆序〉，頁4上-4下。

⁴⁵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首，〈王鶚序〉，頁5上-6上。

三、東平府學之創建

山東在金代（1115-1234）百餘年統治下，學風鼎盛，人才輩出。其中，位居山東精華地區的東平，轄及孔子故居曲阜（今山東曲阜）等地，孔廟林立，是當時華北的學術重鎮之一，元好問即稱「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為盛。」⁴⁶自金宣宗於貞祐間遷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後，華北呈現混亂，東平因戰亂不斷，學校漸趨廢棄荒蕪，學風盡失。至嚴實入據東平，招募四方儒士，始於舊學之地復建學校，籌設府學。⁴⁷嚴忠濟時，以行臺東北地增建東平府學，立法定制，頗具規模。元憲宗蒙哥汗二年（1252，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六月，府學落成，嚴忠濟親率諸生著禮服行禮，聘請第五十一代衍聖公孔元措（1181-約1252）至東平。⁴⁸當時，東平府學的建築，可分為前、後兩部分，前有禮殿與賢廊，禮殿內雕刻有先聖先賢像於其中，賢廊則供奉七十子與二十四大儒繪像，以示尊敬所用。後有閣、庫、堂宇、齋館、庖廡與庭廡等建築，為教授講學、學子就學之處，並提供師生飲食、住宿之所。

府學內的上課地點，大致分為東序、西序，凡「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稟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凡「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⁴⁹換言之，府學招收的學生有兩類，一為各地優秀的生徒，共有六十餘名；二為孔、孟、顏氏子孫，共十五人。所有學生都由府學提供廩給，一年四次考試，決定成績高低。⁵⁰此外，東平府學亦收容前金太常樂師，教習太常登歌樂。經過嚴實父子提倡，東平府學成為華北最具規模學校，東平成為華北的學術重鎮，吸引四方名士講學、就學。

當時，嚴實父子在東平招募各地士人，禮賢下士，並依照個人的長才，或名聲高低，各司其職，或講學、就學於東平府學，⁵¹或服務於東平幕府，為嚴氏父

⁴⁶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21，〈御史張君墓表〉，頁1上-3上。

⁴⁷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26，〈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有序〉，頁5上-7上。

⁴⁸ 姚從吾，〈金元之際孔元措與《孔教》在蒙古新朝的繼續〉，《姚從吾先生全集》（台北：正中書局，1982），第7冊，頁66-78。

⁴⁹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32，〈東平府新學記〉，頁3上-6下。

⁵⁰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32，〈東平府新學記〉，頁3上-6下。

⁵¹ 如康暉說《書》，李昶說《春秋》，李禎說《大學》等。詳見元·元明善，《清河集》，卷

子的幕僚，以為獻策所用。⁵²嚴氏的舉措，吸引許多希望發揮長才的士人投靠，這些士人的背景不同，有的原為金朝官員或名士，後投靠到嚴實麾下，稱為金源遺士；有的為東平府學培育的士人；有的則從師於東平士人。從楊奐的記載：「東平行臺公宴于東園，是日衣冠畢集」⁵³，可以略窺當時東平人才濟濟的盛況。

四、東平的士人與事蹟

嚴氏治理時東平幕府內的士人，各有所長，各司其職，影響的領域或為政治，或為學術，不盡相同。以下，先依實際參與東平政務者或於東平府學教、學者，輔以東平招募之士人，或府學培養之士人為區別，逐一簡述東平士人的事蹟：

甲類：東平幕府的核心士人，共八人

宋子貞（1189-1268），字周臣，潞州長子（今山西長子）人。弱冠之時，曾與族兄同補太學生。金末大亂，宋子貞率眾民歸東平行臺嚴實。嚴實素聞其名，遂「招置幕府，用為詳議官，兼提舉學校」，是最早進入東平的士人。宋子貞為嚴實重用後，成為嚴氏父子的核心幕僚，推薦各地名士進入東平幕府，如「拔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羈旅，與之同列」⁵⁴並負責籌建東平府學，以為培養士人。

嚴忠濟嗣侯後，授宋子貞為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協理東平政務。宋子貞為此「作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曄、王磐為教官」⁵⁵，擴大東平府學規模。此舉，使得齊魯儒風，為之一變，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才多於他鎮。」⁵⁶在嚴氏父子與宋子貞的積極提倡，東平的學術得以振興，東平府學人才濟濟，東平逐漸成為華北的學術、文化重鎮。⁵⁷

6，〈參政商文定公墓碑〉，頁 540。

⁵² C.C.Hsiao, "Yen Shih",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pp60-73。

⁵³ 金·楊奐，《還山遺稿》，卷上，〈東遊記〉，頁 471。

⁵⁴ 明·宋濂，《元史》，卷 159，〈宋子貞傳〉，頁 3735-3736。

⁵⁵ 明·宋濂，《元史》，卷 159，〈宋子貞傳〉，頁 3735-3736。

⁵⁶ 明·宋濂，《元史》，卷 159，〈宋子貞傳〉，頁 3735-3736。

⁵⁷ 宋子貞長期擔任東平行臺參議官，領學校事兼提舉太常禮樂，不論是東平府學的規劃，

忽必烈稱帝中原後，宋子貞得薦至朝廷任官。中統元年（1260）拜右三部尚書⁵⁸。至元二年（1265）改任翰林學士，旋拜平章政事（從一品），負責立法創制，頒行典章制度。三年（1266），以老稱疾辭。⁵⁹宋子貞可視為東平士人中，影響力最大、任官階最高、最具指標意義者。

賈居貞（1217-1280），字仲明，真定獲鹿（今河北正定）人，金宣宗左丞賈益謙（1146-1226）之孫。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宋理宗紹定五年，元太宗窩闊臺汗四年），賈居貞因避戰亂居東平，以善吏事得嚴實招募，「甫冠，為（東平）行臺從事」，⁶⁰負責擬定各項法制，處事公正，賢名遠播。又，曾薦同宗賈起入仕東平，為元好問所稱許。⁶¹

後，賈居貞以善工事為忽必烈賞識，監築上都。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正五品）。至元元年（1264），任參議中書省事（正四品）。十四年（1277）後，以伐宋有功遷湖北道宣慰使（從二品）、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從二品）。十七年（1280），以疾卒，諡文正，追封定國公。⁶²

商挺（1208-1288），字孟卿，曹州濟陰（今山東曹縣）人，曾與元好問、楊奐遊。嚴實久聞其名，禮聘至東平，擔任嚴實的家庭教師，負責教育諸子。此外，商挺亦助嚴氏興學養士，制定禮樂，廣招各方之士，養之優厚。若說宋子貞以建東平府學，振興東平學風為人稱頌；則商挺以廣攬名士，為人所詠，如蘇天爵即稱：「東州多士，公（商挺）實作之」⁶³。

商挺後為忽必烈賞識，於中統二年（1261）拜中書參知政事（從二品），詳定

乃至興建，或是招募士人，都由宋子貞實際負責。東平學風之所以興盛，實與宋子貞有密切關係。相關內容，可以參看常大群，〈元初東平府學的興盛及其原因〉，《齊魯學刊》，第6期（2000），頁26-29；以及晏選軍，〈嚴實父子與金元之交的東平文化〉，《殷都學刊》，第4期（2001），頁54-58。

⁵⁸ 中統建元，尚無六部細則，中書省下僅置左三部與右三部，各置尚書二人、侍郎二人等。其中，左三部統籌吏、戶、禮事；右三部則隸兵、刑、工事。至元元年（1264），改置吏禮部、兵刑部、戶部、工部等。七年（1270），始置六部尚書。宋子貞於中統元年拜右三部尚書，掌理兵、刑、工事。詳見《元史·百官志一》。

⁵⁹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0，〈平章宋公傳〉，頁199-203。

⁶⁰ 明·宋濂，《元史》，卷153，〈賈居貞傳〉，頁3622。

⁶¹ 賈起，字顯之，東平人，金左丞賈益謙從孫，與賈居貞有親戚關係，兩人應為堂兄弟。金·元好問，《遺山集》，卷34，〈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頁1下-5上。

⁶²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台北：新興書局，1975），卷85，〈賈居貞傳〉，頁10下。

⁶³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1，〈參政商文定公傳〉，頁218。

政事，為東平諸士中最早入朝，且任官階僅次於宋子貞者。至元十年（1273），商挺改授安西王忙阿剌（世祖子，？-1278）相（從二品），輔佐政事。十五年（1278），安西王妃因嗣王繼承問題，擅殺王相趙炳（1222-1280，《元朝名臣事略》作「趙炳」），獄事牽連商挺，遭罷官。⁶⁴後雖得平反，商挺已無任官。二十五年（1288），卒，諡文定。

李昶（1202-1289），字士都，東平須城（今山東東平）人。父李世弼，以才文於世，李昶受父影響，弱冠即以通《春秋》名於世。金宣宗興定二年（1218），父子同中進士，一時傳為美談。⁶⁵金末，李世弼辭官歸隱，嚴實久聞李氏父子名聲，遂聘李世弼為東平府學教授、李昶為行軍萬戶府知事。嚴忠濟嗣侯後，李昶逐一就各項「府政得失，民生利病，屢為嗣公言之。」⁶⁶並與宋子貞共同擘畫圖遠，培養儒士，「一時名士，若李謙、馬紹、吳衍輩，皆出其門」⁶⁷，「魯諸生執經受業者，前後非一」。⁶⁸

中統元年（1260），李昶入朝為官。二年（1261），朝廷以嚴忠範代兄為嗣侯，並以李昶為翰林侍讀學士（從三品）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偕同治理東平。至元五年（1268），擢李昶為吏禮部尚書，舉凡格品條式、選舉禮文之事，多出自其裁定。八年（1271），任山東提刑按察使（正三品），旋致仕。

劉肅（1187-1263），字才卿，威州洺水（今河北威縣）人。金宣宗興定二年（1218）進士，累遷戶部主事。金亡，劉肅舉家依東平嚴實，任行軍萬戶府經歷，成為嚴實幕官。⁶⁹劉肅於東平時，負責財政及吏治，並擘畫東平各項財經政策，且因執行得宜，使東平遠較其他地區安定富庶。

忽必烈久聞劉肅名，於元憲宗蒙哥汗二年（1252，宋理宗淳祐十二年）招納

⁶⁴ 安西王忙阿剌（？-1278），世祖忽必烈子，封地西安。至元十五年（1278），王薨。王妃請立子阿難答（嗣安西王，？-1307，後於大德十一年與武宗爭奪帝位失敗，為武宗弟愛育黎達力八達，即後來的仁宗所殺）為嗣王，朝廷未允，以王相趙炳、商挺暫行政事。十七年（1280），王相趙炳等人因與王妃意見不合，為安西王妃藉故逮入獄並殺之。朝廷疑安西王妃擅殺朝廷官員，追究相關人等，商挺遂捲入其中，遭罷官並入獄，後得獲釋。趙炳，《元史》有傳。

⁶⁵ 明·宋濂，《元史》，卷160，〈李昶傳〉，頁3761-3762。

⁶⁶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2，〈尚書李公傳〉，頁248。

⁶⁷ 明·宋濂，《元史》，卷160，〈李昶傳〉，頁3761-3762。

⁶⁸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2，〈尚書李公傳〉，頁248。

⁶⁹ 明·宋濂，《元史》，卷160，〈劉肅傳〉，頁3763-3764。

劉肅入潛邸，任邢州（今河北邢台）宣撫使。中統元年，授真定（今河北正定）安撫使，以為定財賦之策。二年，拜右三部尚書（正三品）兼議中書省事，一時典憲，多出劉肅之手。⁷⁰

徐世隆（1205-1285），字威卿，陳州西華（今河南西華）人。登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進士，曾任縣令。金亡後，嚴實素聞徐世隆名，遂招納為東平行臺幕官。徐世隆於東平時，親自署題考試，擢用高中者，親自講學，自擬課試之文，與為楷式，並力促嚴實「收養寒素，一時名人多歸之」⁷¹，如閻復、孟祺、張孔孫、夾谷之奇等人，均為東平府學培養名士。⁷²且，因徐世隆「明習前代典故，尤精律令，善決疑獄」⁷³，東平的法制政策，亦多由徐世隆裁決。

中統元年，徐世隆入仕任太常卿兼提舉本路學校事，於東平教習太常登歌樂，以備大祀。至元元年（1264），徐世隆拜翰林侍講學士兼太常卿（從三品），朝廷詔命典冊，多出自於徐。七年（1270），拜吏部尚書（正三品），制定銓選之法。其後，累遷東昌路總管（正三品）、淮東道按察使（正三品）等職。

張昉（?-1274?），字顯卿，東平汶上（今山東汶上）人，父張汝明（1157-1233）。⁷⁴張昉於金末曾試補吏部令史。金亡，為嚴實辟為掾，後以才進幕職。張昉任東平府事時，擅長吏事，凡事「躬閱案牘，左酬右答，咸得其當，事無留滯」。⁷⁵中統四年（1263），參知政事商挺薦張昉入朝為官，累遷中書左右司郎中（正五品）等職，專職財賦。至元十一年（1274），拜兵刑部尚書（正三品）。⁷⁶

張孔孫（1233-1307），字夢符、寓軒，洛水（今河北威縣）人。父張澄，金末為嚴實招募任幕官，授東平萬戶府參議。張孔孫成長於東平，就學於東平府學，師從元好問。⁷⁷既長，辟為萬戶府議事官，任嚴忠濟幕官。時前金太常樂師流寓

⁷⁰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0，〈尚書劉文獻公傳〉，頁199。

⁷¹ 明·宋濂，《元史》，卷160，〈徐世隆傳〉，頁3768-3769。

⁷²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2，〈太常徐公傳〉，頁251。

⁷³ 明·宋濂，《元史》，卷160，〈徐世隆傳〉，頁3768-3769。

⁷⁴ 張汝明（1157-1233），字子玉，舉金衛紹王大安元年（1209）進士，累官至治書侍御史。詳見金·元好問，《遺山集》，卷21，〈御史張君墓表〉，頁1上-3上。

⁷⁵ 明·宋濂，《元史》，卷170，〈張昉傳〉，頁4000。

⁷⁶ 元代於至元七年（1270）始置六部，各設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八年（1271），復併為兵刑、吏禮、戶、工等部。十三年（1276），又復為六部，並為定制。張昉於十一年（1274）拜兵刑部尚書。詳見《元史·百官志一》。

⁷⁷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1988）第

東平，即由張孔孫安頓這些樂師，並於府學教習太常登歌樂。

至元元年（1264），張孔孫獲徐世隆薦任太常寺奉禮郎，教習太常登歌樂，累遷戶部員外郎（從六品）、南臺侍御史（正四品）、商議中書省事（正四品）、湖北道提刑按察使（正三品）、禮部尚書（正三品）、翰林學士承旨（從二品）等職。

乙類：講學、就學東平府學者，共十七人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太原秀容（今山西太原）人，少從郝天挺（1160-1217）⁷⁸學，登金宣宗興定五年（1221，宋寧宗嘉定十四年，元太祖十六年）進士，累遷南陽縣令、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等職。金亡，不復出仕，以復興金源文化為己任，蔚為當時文學宗師。後，為嚴實禮聘至東平，除教授學子外，並舉薦許多金源遺士投效於東平，使得東平的學風大盛，成為金源文化之重鎮。⁷⁹換言之，東平所以於金末元初成為華北學術重鎮，除嚴氏父子禮賢下士，提倡學術外，元好問的名聲吸引諸士投靠，亦為原因之一。

張澄，字之純、仲經，洛水（今河北威縣）人，約生於金世宗（1161-1189）大定年間，父曾任洛水縣令。金末，張澄北渡東平，嚴實久聞其名，乃聘為幕府參議與諸子之家庭教師。⁸⁰子，張孔孫。

康曄，字顯之，金高唐州（今山東高唐）人，登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進士，以詩賦聞於世。金亡，宋子貞等人延攬康曄等人至東平府學，負責教授府學諸儒，一時之間，「四方學者雲集，以行能著聞者，百餘人」⁸¹，可知康曄在當時的名聲之顯，如閻復、夾谷之奇等人，均是康曄的學生。

張特立（1178-1253），字文舉，曹州東明（今山東東明）人，登金章宗泰和三年（1203）進士，累遷至監察御史，後退居鄉隱。⁸²金亡，張特立為宋子貞等人薦任東平府學教授，嚴實特加禮遇，直至病卒。⁸³

12 冊，卷中之下，頁 33。

⁷⁸ 郝天挺（1160-1217），字晉卿，澤州陵川（今山西陵川）人，金宣宗興定元年（1217），卒。孫郝經（1223-1275），從學於元好問，因得忽必烈信任，中統元年（1260）以國信使身分赴南宋，旋遭羈押，至至元十二年（1275）始得北返，同年卒。郝經著《陵川集》、《續後漢書》。

⁷⁹ 元·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點校本），卷 126，〈元好問傳〉，頁 2742。

⁸⁰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 24，〈張君墓誌銘〉，頁 12 下-14 上。

⁸¹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卷 52，〈康曄傳〉，頁 3 下-4 上。

⁸² 元·脫脫，《金史》，卷 128，〈張特立傳〉，頁 2773-2774。

⁸³ 明·宋濂，《元史》，卷 199，〈張特立傳〉，頁 4475-4476。

王磐（1202-1293），字文炳，廣平永年（今河北永年）人，登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進士，不赴任官。金亡，嚴實「興學養士，迎磐為師」⁸⁴，任東平府學教官，從學者數百餘人。中統以後，王磐得忽必烈賞識，入朝為官，累遷至翰林學士承旨。王磐任職於翰林國史院時，大力提拔、舉薦東平諸士，如李謙、閻復等人。

李謙（1231-1310），字受益，東阿（今山東東阿）人。曾就學於東平府學，師從李昶、元好問⁸⁵，與徐世隆、孟祺、閻復、楊桓齊名於東平府學，李謙的名聲居首。李謙後至東平府學任教授，生徒四集，曾短暫任東平萬戶府經歷。至元時，王磐聞其名，召李謙入翰林國史院任職。⁸⁶

孟祺（1241-1291），字德卿，宿州符離（今安徽宿州）人。金末，舉家為避亂北逃，「時嚴實修學校，招生徒，立考試法，祺（孟祺）就試，登上選」，就學於東平府學。孟祺後為嚴忠濟拔擢為幕府書記。至元以後，孟祺為宋子貞等人賞識，薦舉入朝，授國史院編修官，「一時典冊，多出其手」。十三年（1276），隨伯顏南征有功，授嘉興路（今浙江嘉興）總管（正三品）。後，以疾辭官歸東平。⁸⁷

閻復（1236-1312），字子靖，山東高唐（今山東高唐）人。弱冠，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文，預選者四人，復（閻復）為首、徐琰、李謙、孟祺次之」⁸⁸。就學東平府學期間，師名儒康曄，頗負名聲。蒙哥汗九年（1259，宋理宗開慶元年），獲嚴忠濟擢為幕府書記。至元八年（1271），得王磐舉薦入朝為官，授翰林應奉，累遷至翰林學士（正三品）。

王構（1245-1310），字肯堂，東平人。弱冠時，以詞賦中選東平府學。嚴忠濟時，以王構學有所長，聘為東平幕府書記。至元十一年（1274），王構得賈居貞薦入朝為官。十三年（1276），隨伯顏南征有功，累遷禮部郎中（從五品）、治書侍御史（正四品）、翰林學士等職。元貞初，曾擢參議中書省事（正四品），後任

⁸⁴ 明·宋濂，《元史》，卷 160，〈王磐傳〉，頁 3751。

⁸⁵ 根據郝經、李謙與楊桓等所撰〈元好問墓銘〉，李謙與楊桓自稱為「門生」，顯見李、楊二氏與元好問間有師生關係。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收入《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十七年刊本影印，2003）第一冊，卷 29，〈遺山先生墓銘〉，頁 371-374。

⁸⁶ 明·宋濂，《元史》，卷 160，〈李謙傳〉，頁 3768。

⁸⁷ 明·宋濂，《元史》，卷 160，〈孟祺傳〉，頁 3771。

⁸⁸ 明·宋濂，《元史》，卷 160，〈閻復傳〉，頁 3772。

濟南路總管（正三品）。⁸⁹

李之紹（1253-1326），字伯宗，東平平陰（今山東平陰）人。弱冠時，曾入東平府學就讀，師從李謙，後任東平府學教官，從學者眾。至元三十一年（1294），李之紹為李謙、馬紹等人薦任，入仕為官，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此後，累遷國子司業（正五品）、國子祭酒（正五品）、翰林直學士等負責教育、藝文之職。⁹⁰

申屠致遠（?-1298），字大用，東平壽張（今山東東平）人。弱冠，曾就學於東平府學，與李謙、孟祺等齊名。中統二年，朝廷罷嚴忠濟侯位⁹¹，改派流官治東平，惟東平府學續留不變。至元七年（1270），崔斌（1222-1278）守東平時，聘申屠致遠為府學官。十四年（1277），授杭州路推官（從六品），因得罪西僧楊璉真加，改遷為監察御史（正七品）。⁹²

曹伯啟（1255-1333），字士開，濟寧陽山（今安徽陽山）人。弱冠，曾就學於東平府學，師從李謙，據蘇天爵言：「國初，東平嚴侯興學作士，公（曹伯啟）往遊焉。師事翰林承旨李公謙。」⁹³至元中，獲薦為蘭溪縣（今浙江蘭溪）主簿（從八品）。後，累遷監察御史（西臺，正七品）、刑部侍郎（正四品）、西臺中丞（從二品）等職。⁹⁴夾谷之奇（?-1289），字士常，女真人。幼時遷居東平，以試選入東平府學就讀，受業於康曄。至元以後，曾任濟寧教授，十三年（1276）授行省左右司郎中（正五品），累遷翰林直學士（從四品）、侍御史（正四品）、吏部尚書（正三品）等職。⁹⁵

徐琰，字子方，號容齋、養齋或汶叟，東平人。嚴實招諸生入府學時，徐琰與閻復、李謙、孟祺等人以試入選，後曾任東平府學教官。至元十八年（1281），獲薦入朝為官，遷中書左司郎中（正五品）。⁹⁶二十六年（1289），拜南臺御史中

⁸⁹ 明·宋濂，《元史》，卷 164，〈王構傳〉，頁 3855。

⁹⁰ 明·宋濂，《元史》，卷 164，〈李之紹傳〉，頁 3862。

⁹¹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四部叢刊本），卷 67，〈詔罷東平路萬戶嚴忠濟〉，頁 659。後，朝廷以嚴忠濟弟嚴忠範為東平路行軍萬戶兼總管，然權力已掌握於朝廷。至元十年（1273），朝廷以嚴忠範征討宋軍失利為由，罷嚴忠範東平萬戶銜，改工部侍郎，移居大都。

⁹² 明·宋濂，《元史》，卷 170，〈申屠致遠傳〉，頁 3989。

⁹³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 10，〈曹文貞公祠堂碑銘〉，頁 150-153。

⁹⁴ 明·宋濂，《元史》，卷 176，〈曹伯啟傳〉，頁 4099。

⁹⁵ 明·宋濂，《元史》，卷 174，〈夾古之奇傳〉，頁 4061。

⁹⁶ 清·沈翼機，《乾隆浙江通志》（台北：華文書局，中國省志彙編據清乾隆元年刊本影

丞（從二品），旋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從二品）。⁹⁷二十九年（1292），改除浙西道廉訪使（正三品）。⁹⁸

吳衍，事蹟不詳。弱冠，曾與馬紹、李謙等人就學於東平府學，師從李昶。至元二十五年（1288），拜南臺侍御史（正四品）。三十年（1293），除南臺中丞（從二品）。⁹⁹

馬紹（？-1300），字子卿，濟州金鄉（今山東金鄉）人。弱冠，曾於東平府學就讀，師從李昶。¹⁰⁰至元十年（1273），獲薦入仕，累遷山東道提刑按察使（正三品）、中書參知政事（從二品）、左丞（正二品）、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元貞元年（1295），拜江浙行省右丞（正二品）。大德三年（1299），除河南行省右丞（正二品）。¹⁰¹

楊桓（1233-1299），字武子，兗州（今山東兗州）人。弱冠，曾就學於東平府學，師從元好問。中統四年（1263），補為濟州教授，後遷秘書監丞。至元三十一年（1294），拜監察御史。大德三年（1299），授國子司業，同年卒。¹⁰²

欒之昂，字子英，盟津（今河南盟津）人。祖欒玉、父欒翔，於金亡後舉家依東平嚴實，以避戰火。嚴實禮士待客，授欒玉為東平勸農官，欒翔為廣備庫使。欒之昂弱冠，曾就學於東平府學。至元以後，以「好讀書，善法律」獲薦為吏。二十一年（1284），授長沙縣（今湖南長沙）丞（正八品）。大德四年（1300），遷為某路¹⁰³推官（從六品），卒於任內。¹⁰⁴

丙類：其他（客居者、非士人），共二人

王玉汝（？-1255），字君璋，東平人，善習吏事。嚴實入東平，署王玉汝為

印，1967），卷 147，〈名宦二〉，〈徐琰傳〉，頁 6 上。

⁹⁷ 元·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台北：大化書局，1983），卷 6，頁 34 上。

⁹⁸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卷 7，〈徐琰傳〉，頁 22 上。

⁹⁹ 元·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卷 6，頁 34 上、37 上。

¹⁰⁰ 明·宋濂，《元史》，卷 173，〈馬紹傳〉，頁 4052。

¹⁰¹ 明·李賢，《大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卷 23，〈馬紹傳〉，頁 44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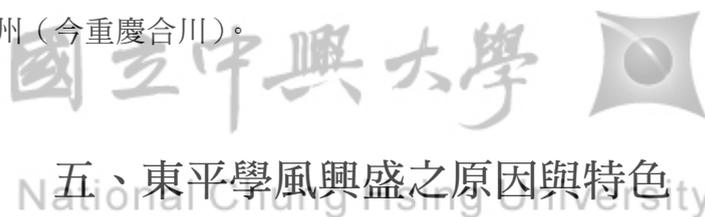
¹⁰² 明·宋濂，《元史》，卷 164，〈楊桓傳〉，頁 3852-3854。

¹⁰³ 《雪樓集》稱欒之昂為中平路推官，然元代並無中平路，疑為東平路之誤植。筆者以為，此誤植之因，可能有二：一為原作正確，後世傳抄時誤植；二為原作即誤，因《雪樓集》作者程鉅夫為宋末元初之南人，恐不熟悉北方地名，又「東」與「中」二字不論在筆劃、讀音上，均有相似之處，因而誤植。

¹⁰⁴ 元·程鉅夫，《雪樓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1988）135 冊，卷 25，〈欒之昂傳〉，頁 378。

行臺令史。後，耶律楚材（1190-1243）以王玉汝有才，納為門下，北上漠北。元太宗窩闊臺汗十年（1238，宋理宗嘉熙二年），蒙廷欲以東平分封蒙古勳貴，裂而為十，王玉汝諫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並曰：「玉汝為嚴公之使，今嚴公之地分裂而不能救，止無面目還報，將死此荒寒之野。」¹⁰⁵王玉汝之議為蒙廷採納，遷東平行臺知事。自後，王玉汝往返東平與漠北，折衷朝廷與嚴氏異見，力保嚴氏於東平的勢力。蒙哥汗五年（1255，宋理宗寶祐三年），嗣侯嚴忠濟以王玉汝為參議，擘畫東平官署、府學，事成而卒。

李楨（1199-1258），字榦臣，西夏宗室，以經史聞於世。大蒙古國時，以質子入侍窩闊台汗。窩闊台汗十年（1238，宋理宗嘉熙二年），奉命尋訪天下儒士。期間，李楨受嚴實之請，入東平任嚴忠嗣等人家庭教師。¹⁰⁶李楨後返漠北，海迷失（元定宗貴由汗后，1249-1251稱制）稱制三年（1251，宋理宗淳祐十一年），授襄陽軍馬萬戶，以備取襄陽、南征宋之道。蒙哥汗八年（1258，宋理宗寶祐六年），卒於合州（今重慶合川）。



五、東平學風興盛之原因與特色

金末蒙興之際，華北的主要學風有二：一為傳播南宋理學之學風，以忽必烈潛邸金蓮川幕府的策士為主¹⁰⁷，如許衡（1209-1281）¹⁰⁸、竇默（1196-1280）¹⁰⁹、姚樞（1203-1280）¹¹⁰等人，因尚程、朱理學而稱之；二為承襲金源文化之學風，

¹⁰⁵ 明·宋濂，《元史》，卷 153，〈王玉汝傳〉，頁 3616。

¹⁰⁶ 明·宋濂，《元史》，卷 148，〈嚴忠嗣傳〉，頁 3508。

¹⁰⁷ 關於忽必烈潛邸幕府的背景、作用與幕僚人數等相關問題，可以參看蕭啟慶師，〈忽必烈潛邸舊侶考〉，《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豐出版，1983），頁 263-301。

¹⁰⁸ 許衡（1209-1281），字仲平，世稱魯齋先生，河內（今河南沁陽縣）人。忽必烈於潛邸時，即特聘許衡，商議政事。中統建元後，許衡曾任國子祭酒、中書左丞等職。期間，以所著書籍為國子學課本，講授程、朱理學。至元十八年（1281），卒，謚文正，封魏國公。著《魯齋遺書》。

¹⁰⁹ 竇默（1196-1280），字子聲、漢卿，廣平肥鄉（今河北肥縣）人。金亡，曾與許衡、姚樞交游，以講授理學為業，後為忽必烈特聘至潛邸。中統以後，授翰林侍講學士、昭文館大學士等職。至元十七年（1280），卒。竇默，《元史》有傳。

¹¹⁰ 姚樞（1203-1280），字公茂，號雪齋、敬齋，洛陽（今河南洛陽）人。中統建元後，曾

流行於河北、山東等地，因佔據該地的漢軍世侯所招募策士，以前金遺士居多，稱之。¹¹¹

就前者而言，主要承襲兩宋以來的程、朱義理之學。源於北宋的理學，隨宋室南遷而往南流傳，而在金代統治下的華北，理學不盛。元太宗窩闊臺汗七年（1235，宋理宗端平二年），蒙軍南征宋地，於德安府（今湖北安陸）俘虜趙復（約1185-約1265），並攜往華北。¹¹²咸信理學重新流行於華北，即始於趙復之北上。趙復游學北方後，得領中書事楊惟中（1205-1256）等人協助，「建太極書院於燕都（即今北京），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歲時釋奠。」又「以趙復為師儒右」¹¹³，一時之間，「燕之士大夫聞其議論證據，翕然尊師之。」¹¹⁴當時，「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才其間」¹¹⁵，理學遂盛於華北。

許衡於脫列哥那（元太宗窩闊台汗后，1242-1246稱制）稱制元年（1242，宋

任中書左丞、昭文館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等職。至元十七年（1280），卒。姚樞，《元史》有傳。

¹¹¹ 金末蒙興之際的金源文化傳承，孟繁清先生認為，燕趙（今河北、山西）地區的文化人，是維護、發揚金源文化的主要動力，如耶律楚材（1190-1244）、劉秉忠（1216-1274）、竇默（1196-1280）、劉因（1249-1293）、元好問等人，藉由相互舉荐、漢軍世侯（真定史氏、保定張氏、藁城董氏）的延攬等，成功的延續金源文化。詳見孟繁清，〈社會變革與文化人的歷史抉擇〉，《金元時期的燕趙文化人》（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頁 1-30。筆者以為，孟先生將山東排除於金源文化之說，值得商榷。其實，山東於金代時，文風遠較山西鼎盛，進士輩出，社會經濟亦較山西發達，不論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都屬金代的重心之地。大蒙古國時，東平嚴氏興學納士之舉，對於金源文化之傳承、金源遺士之保護，都為各漢軍世侯之首，華北之冠。故，筆者將東平視為金源文化之主要地區，東平學風為金源文化之延續。

¹¹² 趙復（約 1185-約 1265），字仁甫，宋德安府（今湖北安陸）人。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德安府為蒙古軍攻陷，趙復得姚樞、楊惟中營救，游學、講學於華北，自號江漢先生。關於趙復生平事略，可以參考《元史》，卷 189，〈趙復傳〉，頁 4313-4315。又，關於理學在華北的傳播情況，可以參見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元史論叢》，第二輯（1983），頁 217-224。關於太極書院的地位與意義，則可參見孫建平，〈趙復和太極書院對元代理學發展的促進〉，《湖南大學學報》，第 19 卷第 3 期（2005），頁 32-35。

¹¹³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 5，〈中書楊忠肅公傳〉，頁 85；及元·郝經，《陵川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6 冊，1983），卷 26，〈太極書院記〉，頁 17 上-18 下。

¹¹⁴ 元·楊弘道，《小亨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8 冊，1983），卷 6，〈送趙仁甫序〉，頁 10 上-11 下。

¹¹⁵ 元·姚燧，《牧庵集》，卷 4，〈序江漢先生事實〉，頁 38-39。

理宗淳祐二年），得趙復傳授之程、朱學說後，即以倡明理學為己任，從此聲名益著。忽必烈即位後，許衡任國子祭酒，即以程、朱學說為國子學教材，並為定例，且許氏門生遍佈各地，任官者眾，均尊許衡為師、為祖，如繼許衡為國子祭酒者王恂（1235-1281）、耶律有尚、姚燧（1238-1313）、吳澄（1249-1333）等人，都是許衡之門生或尊理學者，延續許衡尊程、朱之學，故元代的理學派又稱為魯齋學派。¹¹⁶

元代的魯齋學派係以國子監為重心。國子監，創於至元八年（1271）¹¹⁷，下設國子學及蒙古、回回國子學。國子學的職責在於教育學子，學習儒家經典，培養崇儒教化之人，傳承文化。¹¹⁸元代的國子學在魯齋學派控制之下，以程、朱之學為尚，排斥他學。¹¹⁹如魯齋後學吳澄，任國子祭酒時欲折衷朱、陸（陸九淵，1139-1193）之學，遭議者「以澄為陸氏之學，非許氏（許衡）尊信朱子本意」¹²⁰，去職。

據上所述，魯齋學派的士人並非以地域為劃分標準，而是以理念之相仿為尚，遂能容納南人、北人，甚至各種不同的族群，卻難以接受不同理念者，為學術意識較強的團體，與東平學派不同。魯齋學派在元初的政治與文化上，都維持相當的影響力，與東平分別門戶，分庭抗禮。順帶一提，元廷對於國子學的功能，似乎定義為官吏的培訓所，與魯齋學派期望的初衷，存在落差。元代，許多國子學生學成後，被派任至各地擔任基層官員，或以儒生充吏。簡言之，元代的國子學，實際為基層官僚系統的主要來源。¹²¹

二為河北、山東等地的金源文化，係沿襲金代的士風，原經金末蒙興之際的動亂而趨於沒落，得東平嚴氏、真定史氏、保定張氏、藁城董氏等漢軍世侯支持而逐漸復興，成為華北主要的學風。這些漢軍世侯或多或少關心文藝發展，興建

¹¹⁶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許文正公傳〉，頁179。

¹¹⁷ 早於大蒙古國時，即置有國子學，惟當時係由全真教士主掌學務，教授語言、文書為主。相關研究，可以參看蕭啟慶師，〈大蒙古國的國子學-兼論蒙漢菁英涵化的濫觴與儒道勢力的消長〉，《蒙元史新研》，頁63-94。

¹¹⁸ 明·宋濂，《元史》，卷87，〈百官三〉，頁2192-2193。關於元代國子學的功能、政治意義等問題，可以參看袁冀，〈元代之國子學〉，《元史研究論集》，頁189-219。

¹¹⁹ 關於魯齋學派與國子學的關係，可以參看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識份子和科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卷5，頁659-679。

¹²⁰ 明·宋濂，《元史》，卷171，〈吳澄傳〉，頁4012。

¹²¹ 許凡，《元代吏制研究》（北京：新華書店，1987），頁85-96。

廟學，招募或培養士人。因為河北、山東舊為金代文教盛地，學術重鎮，中舉任官者眾，不論真定、保定、藁城、東平等地所招募之士人，都以前金遺士居多，這些士人許多曾為金代進士，曾於金代任官，他們深受金源文化洗禮，以恢復、振興金源文化為志。

筆者以為，東平學風的興盛，與上述金源文化之復興，息息相關。換言之，東平學風興盛之因，可歸納為政治與文化因素：就政治因素而言，大蒙古國時，華北地區戰亂頻繁，民不聊生。然而，各地的漢軍世侯在爭戰的同時，仍能招募儒士，禮賢下士，興學辦校，傳承金源文化，東平嚴氏亦不例外，如嚴實常「折節自厲，間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¹²²，為元好問所稱。東平嚴氏提倡學風之舉，招募士人之成果，最為豐碩，當時的東平學風幾同於金源文化之代稱。如元好問所以受聘東平，除嚴實提供良好環境及尊重的態度外，重點是得以保存金代文物，元好問於居留東平時，秉持「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紀錄」¹²³態度，力圖振興金源文化。

就文化因素而言，東平位於山東之境、曲阜之鄰，儒學、文風深厚。自北宋以降，朝廷會賜封孔子嫡裔為衍聖公，此舉既宣示國家尊崇儒學，亦顯示帝王統治權力的道統，增加儒士的向心力，蒙古統治者亦不例外。¹²⁴蒙古於窩闊臺汗五年（1233，宋理宗紹定六年，金哀宗天興二年），即「詔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措襲封衍聖公」。孔元措受蒙廷襲封為衍聖公後，返回曲阜故里，受嚴實禮聘至東平。¹²⁵嚴忠濟時，以孔元措主持府學典禮。嚴氏對於孔、孟、顏氏宗族倍加禮遇，可謂無微不至：

其衣食所須，舍館之安，皆行臺嚴相資給之。親族三百指（即三十人），坐享溫飽，咸其所賜也。以至歲時之祭祀，賓客之往來，閭里之慶弔，窮乏

¹²² 金·元好問，《遺山集》，卷26，〈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頁1上-5上。

¹²³ 元·脫脫，《金史》，卷126，〈元好問傳〉，頁2743。

¹²⁴ 蕭啟慶師，〈大蒙古國時代衍聖公復爵考實〉，《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出版，1994），頁51。

¹²⁵ 大蒙古國時，曾短暫出現二支衍聖公（孔元措、孔元用），雙方僵持不下，最後經由嚴實調解，確認為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孔之全（孔元用子）則世襲曲阜縣令。又，關於孔元措至東平的事蹟，可以參見陳高華，〈金元二代的衍聖公〉，《元史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328-345。

之瞻濟，莫不仰庇而取足焉。¹²⁶

嚴氏兩代興學養士之舉，使得當時東平的社會秩序，相對穩定，士風興盛，匯集各地金源文化與遺士，蘇天爵形容當時的東平為「東州既為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為命者，相踵也。」¹²⁷

又，東平學風的特色，可以歸納為下列三點：第一，東平學風係承襲金代以詩辭賦文、吏事為尚的金源文化，核心人物為金源遺士及後學繼承者。這些金源遺士人游走於河北、山東等地，相互交游與舉薦後學，如閻復推薦曹元用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商挺鎮守巴蜀時，將張昉薦為四川等處行樞密院參議等。東平士人藉由交游與舉薦，在文化上，持續傳承並凝聚出一個東平學派，得與魯齋學派並駕齊驅；在政治上，則逐漸出現一個東平派，佔有一席之地。

第二，東平士人延續金代士風，大都以吏才見長，¹²⁸與魯齋學派的士人專善學理，闡發深刻的學說不同。此因，東平府學的立學精神以吏治為基礎，以「招諸生肄進士業」，培養吏才為主，如以學子考試的成績優劣，決定官秩的高低、資給的多寡等，徐世隆曾受命「歲署題考試，等其甲乙，屢中高選者，擢用之」¹²⁹，元好問曾負責校閱考試，預選成績優秀的前四名入東平府學。又，就學於東平府學的學子，多數期待能進入宦途，發揮所長。在東平時，孟祺以考試成績為上選，得選任書記；王構「弱冠以詞賦中選，為東平行臺掌書記」。元時，東平士人曹伯啟派任至南方為官時，南人曾曰：「北方儒者不徒以其名聞，顧有實用如此耶」。¹³⁰簡言之，東平府學的課程、立學宗旨，目的係以教授學子為官之道。至於，單純的著書立說，闡明學理，亦有教授，然似乎並非首要目標。

¹²⁶ 金·李世弼，〈褒崇祖廟記〉，《民國曲阜縣志》（台北：成文書局，據民國二十三年刊本影印，1968），卷8，頁3下-4上；及清·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收入《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清嘉慶二年刊本影印，2003）第一冊，卷21，〈褒崇祖廟記〉，頁669。上述，《民國曲阜縣志》成書年代雖晚至現代，卻錄有〈褒崇祖廟記〉全文；《山左金石志》雖早於《民國曲阜縣志》，惜未錄全文。

¹²⁷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6，〈萬戶嚴武惠公傳〉，頁94。

¹²⁸ 金代實行以進士選拔為令史（吏）的制度，即由進士充任令史，依序累遷至官。故，金代的官員，大都經歷過令史等吏職，熟悉吏事。金代這種儒、吏、官結合的令史制度，擴大儒生入仕的途徑，為元代承襲。孟繁清，〈金代的令史制度〉，《金元時期的燕趙文化人》，頁399-419。

¹²⁹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2，〈太常徐公傳〉，頁251。

¹³⁰ 元·陸文圭，《牆東類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4冊，1983），卷5，〈送曹士開序〉，頁579。

第三，東平士人都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地緣因素。在已知籍貫者之中，東平士人大都來自於華北地區，只有少數來自於安徽、河南等地。其中，大多數人為山東籍，甚至是東平人士，如李之劭、申屠致遠、張特立、李昶等人。故，東平學風亦受濃厚的地緣因素影響。

六、東平學風的影響

綜論前述，東平學風在元代的影響，主要展現在政治、文學、禮樂等三方面。首先，就政治而言，東平士人大都善於吏治、典章制度，懂得治世之道，為統治者所喜。¹³¹忽必烈於潛邸時，就網羅許多東平士人為幕僚，如宋子貞、商挺等人。中統建元後，在朝任官的東平士人，藉由舉才的方式，將其餘有才幹的東平士人推薦入朝為官，如王磐薦李謙與閻復，宋子貞薦孟祺等人，或有老師引薦學生，如李謙舉學生李之紹等。經過一連串的牽引、舉薦後，東平士人在朝為官者眾，逐漸在朝廷形成一股政治勢力，如戴表元（1244-1310）寫給曹元用的信中，提到「東平，今為儒府，諸老先生方以類相，先後進用於朝」。¹³²

就前述東平士人的生平或事蹟可知，世祖中統至成宗（1294-1307）大德時，活躍於政治宦途的東平士人，官至中書或地方參政以上者有五人，若含參議中書省事者，則有八人，加上曾任臺憲中丞者，則有十人；¹³³官止於六部尚書、翰林學士與路總管者，有九人；其餘任官於中低官階者，有若干人。上述人數至少有二十餘人，就單一地區或政治勢力（或言組織）而言，勢力可謂厚實。（可參閱文末附表）

不過，東平士人所任之官，仍以翰林國史院職為主。元代的翰林國史院創置於中統元年（1260），職掌草擬聖旨、制誥、典章等事務，屬於幕僚、參議性質的單位，並無參與政務的權力。元初，任翰林國史院職者，以金源遺士及後學（如

¹³¹ 根據安部健夫先生所言，東平士人因善於詞賦、吏學，受統治者賞識，得入翰林院任職。詳見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識份子與科舉〉，頁 636-679。

¹³²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194 冊，1983），卷 14，〈贈子貞編修序〉，頁 184。

¹³³ 其中，徐衍曾任南臺中丞、江西行省參知政事等職。

從學者)為主流,其中以東平士人佔大多數,如至元二十年(1283),時任濟寧路總管(從三品)的胡祇遹(1227-1293)¹³⁴曾言:「今內外要職人才,半出東原府學(即東平府學)生徒。」¹³⁵大德初(1297),袁桷(1266-1327)¹³⁶以南人身分至翰林國史院任待制時,曾言:「朝廷清望之官曰翰林院、曰國子監,職誥令授經籍,必遴選焉。始命獨東平之士獨多,十居六七。」期間,袁桷「所與交者多東平人,他郡者僅二、三。」除東平士人外,少數翰林為曾投靠其他漢軍世侯者,如王鶚(1189-1273)、李冶(1177-1265)等人。¹³⁷至於,南人任翰林者,更有如鳳毛麟角,少之又少,偶得一見而已,袁桷即感慨「若南士,則猶夫稊米矣。」¹³⁸可見,東平士人在當時的翰林國史院,不論勢力與地位都居於絕對優勢,逐漸形成以東平為標識的派別。誠如蕭啟慶師言:「東平士人延續了晚金的文學傳統,他們的學術根據地在翰林國史院。」¹³⁹

筆者以為,元廷考量東平學派與魯齋學派各有專擅,基於適才適所原則,遂將兩派分居於翰林國史院與國子學,發揮所長,如王鶚為金源遺士之一,早年受聘於保定張柔(1190-1268),後入朝為官,為首任翰林學士。王鶚與東平士人同為金源遺士,素有交游,提拔東平士人為官,不遺餘力,東平之李昶、王磐、徐世隆等人,都受王鶚之舉薦。世祖曾以王鶚與許衡兩人的才幹、能力,求問於孟攀鱗(1203-1267)¹⁴⁰,孟攀鱗對曰:「百一(王鶚)文華之士,可置翰苑;仲平

¹³⁴ 胡祇遹(1227-1293),字紹開,磁州武安(今河北武安)人。中統元年(1260),為宣撫使張文謙辟為員外郎,累遷至江南浙西道宣慰使。有《紫山大全集》存世。胡祇遹,《元史》有傳。

¹³⁵ 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96冊,1983),卷10,〈泗水縣廟學記〉,頁21下-22上。

¹³⁶ 袁桷(1266-1327),字伯長,慶元(今浙江慶元)人,為南宋同知樞密院事袁韶(1157-1234)曾孫。元初,以舉茂才任麗澤書院山長,後獲薦至翰林侍講學士。泰定四年(1327)卒。著有《清容居士集》於世。袁桷,《元史》有傳。

¹³⁷ 王鶚於金亡後,曾投靠於張柔,成為保定張氏的策士。李冶(1177-1265),字仁卿,真定樂城(今河北正定)人,曾登金進士,金亡後,曾短暫投靠真定史氏。至元二年(1265),授翰林學士。李冶、王鶚,《元史》有傳。

¹³⁸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收入《叢刊集成新編》(台北:新文豐,1985)第65冊,卷24,〈送程士安官南康序〉,頁713。

¹³⁹ C.C.Hsiao, "Yen Shih",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pp60-73。

¹⁴⁰ 孟攀鱗(1203-1267),字駕之,雲內(今山西大同)人。曾祖孟彥甫、祖孟鶴、父孟澤民俱為金進士。孟攀鱗登金哀宗正大七年(1230)進士。中統三年(1262),獲薦

（許衡）明經傳道，可為後學矜式。」¹⁴¹或許，孟攀鱗之言，反映時人對於兩派士人各有專長的印象。又，元初時，嫻熟於吏事的金源遺士—包含東平士人，陸續進用於朝，參與擘畫各項品條格式、選舉禮文等典章政事，使得元代的典章制度，融入許多金代的制度，尤以吏制的施行，最為重要。換言之，元代的政治典章制度（或言官制）所以重視吏，如以儒充吏、官吏互用、吏額龐大等現象，係承襲於金代。¹⁴²至於，促使元代官制沿襲金代的推手之一，金源遺士有佔重要的地位。

其次，就文學而言，東平學派的士人，地近齊魯故地，深受儒教慕染，都以詩詞文賦著名，愛好歌詠，提倡風雅，重視禮樂文教；¹⁴³而且，東平士人承襲金源遺風，擅長經世致用之學，較無民族歧見，為忽必烈所喜。至於，與東平學派齊名的魯齋學派，專擅的領域，則與東平學派相異。魯齋學派的士人，大都致力於人格的陶冶，以德行為尚，將求取學問視為己任，帶有豐富的理想性格。¹⁴⁴日本學者安部健夫就將東平學派稱為文章派，魯齋學派稱為德行派。¹⁴⁵

承上述，東平學派的士風較務實，且以漢人居多；魯齋學派的士風較富理想性，南人為數不少，東平學派應該較魯齋學派容易取得統治者信任。實則不然，在重視根腳¹⁴⁶與出身背景的元代而言，魯齋學派的地位遠較東平學派為高，容易取得統治者信任。此因，魯齋學派的許衡、竇默、姚樞等人，早於金蓮川幕府時

授翰林待制。至元初，任陝西五路四川行省事。四年（1267），卒，諡號文定。

¹⁴¹ 明·宋濂，《元史》，卷 164，〈孟攀鱗傳〉，頁 3860。

¹⁴² 關於元代吏制的承襲的依據、淵源等問題，可以參見許凡，《元代吏制研究》，頁 122-135。

¹⁴³ 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識份子與科舉〉，頁 672。

¹⁴⁴ 安部健夫以為，魯齋學派與金源學派的對抗，起因於雙方的思想、價值觀差異，造成彼此在政治上分庭抗禮。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識份子與科舉〉，頁 636-679。筆者以為，兩派的思想雖有差異，但並未明顯區隔；政治上，亦無明顯的對抗，只有良性的競爭關係，與傳統的黨爭不同。以政治而言，在蒙古統治下的漢人，無法掌握絕對的權力，仍需聽從蒙古統治者的意見。故，魯齋與東平兩派沒有惡意競爭的空間、理由。

¹⁴⁵ 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識份子與科舉〉，頁 636-679。

¹⁴⁶ 根腳，係指門第，即個人的出身背景。元代重視個人的根腳，不論蒙古、色目，甚至漢人者都納入評斷的範圍中。所謂有根腳者，係權貴之家；無根腳者，則為一般平民。有根腳者，在政治、社會、法律、經濟等各領域都享有較多特權，反之則無。蕭啟慶師，〈元代蒙古色目進士背景的分析〉，《漢學研究》第 18 卷第 1 期（2000.6），頁 101-128。蕭啟慶師，〈元代科舉與菁英流動：以元統元年進士為中心〉，《元朝史新論》（台北：允晨出版，1999），頁 155-201。原刊於《漢學研究》第 5 卷第 1 期（1997.6），頁 129-160。

代就入潛邸為忽必烈獻策者，深受忽必烈信任。在蒙古傳統中，許、竇、姚等人可謂忽必烈的家臣，地位遠高於其他臣僚。東平學派的士人，早年都曾待過東平行臺，為漢軍世侯嚴氏父子所接納，屬於嚴氏的家臣。後來，東平士人因才華出眾，陸續獲得舉薦入朝為官，參與朝政。但在忽必烈心中，東平士人並非自己一手提拔，忠誠度實不如許、竇、姚等人。

中統建元後，東平學派與魯齋學派的士人，紛紛進陞為朝臣，多人參與中書省事，決策國家大事，甚至拔擢為平章政事、參知政事者，所在多有。可是，更細微的檢視，就會發現兩派的地位，高低有別。

元代的翰林國史院與國子監，性質雖近，都是與文藝、教育有關的機構。然而，翰林國史院主要負責詔令的草擬、典章的制定、禮文的規範、國史的撰修等，事務簡略，容易展現個人的才華，卻較難培植相同理念、學風的人才；翰林學士等職雖享有清高的聲望與官階，卻無重要的政治地位。國子監，係負責教育與傳遞學術、知識之機構，魯齋學派藉由國子學教授程、朱學說，除傳承學風外，亦培養相同學術理念的士人。這些畢業於國子學的士人，除受朝廷分派至各地任官、任吏，成為官僚系統之一，並成為魯齋學派的傳人，繼續宣揚程、朱學說。元代中期以後，魯齋學派的勢力，日益蓬勃，逐漸於學術文化上定於一尊；反之，東平學派雖於元初獲得豐沛的政治地位，因缺少傳承學風的管道，人才日益凋零，逐漸失去與魯齋學派並駕齊驅的實力。

第三，就禮樂而言，東平學風對於元代最大的貢獻在於傳承禮樂制度。金代的宮廷禮樂，係承襲於遼、北宋。金哀宗天興三年（1234，正月哀宗傳位末帝，旋俱卒），金代為蒙古所滅後，金代的宮廷禮樂，隨著太常樂師分散各地而流落民間，其中部分樂師流寓東平。¹⁴⁷元太宗窩闊台汗十年（1238，宋理宗嘉熙二年），時居東平的衍聖公孔元措，請以收錄亡金禮樂於東平，蒙廷遂令：「各處管民官，如有亡金知禮樂舊人，可并其家屬徙赴東平，令元措領之，於本路稅課所給其食。」¹⁴⁸以習太常登歌樂。東平遂成為前金太常樂師的聚集之地。憲宗蒙哥汗二年（1252，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又命「東平萬戶嚴忠濟立局，制冠冕、法服、鐘磬、

¹⁴⁷ 關於金代太常樂師流寓東平的經過，可以參見陳高華，〈大蒙古國時期的東平嚴氏〉，頁 1-23。及門巋，〈元初「世侯文化」的特點及其對元代文學的影響〉，《東南大學學報》，第 6 卷第 2 期（2004），頁 105-110。

¹⁴⁸ 明·宋濂，《元史》，卷 68，〈禮樂二〉，頁 1691。

筍簾、儀物肆習」¹⁴⁹，嚴忠濟乃命張孔孫、徐世隆等人，於府學教習太常登歌樂。

忽必烈即位時，以各項漢制宣示統治天下決心，增加漢族士人的向心力，包含用「新制雅樂，享祖宗於中書省」。為突顯對於禮樂的重視，於中統二年（1261，宋理宗景定二年）令太常少卿王鏞至東平，「督視肆習，以備朝廷之用」¹⁵⁰，並持續擴編樂師人數。此後，由東平訓練的太常樂師，人數從一百四十九人成長至四百餘人。至元二年（1265，宋度宗咸淳元年），朝廷令樂師至大都，為宮廷慶典所奏，始成為元代宮廷禮樂。不過，這些樂師（已編制為禮樂戶）平時仍居住於東平，以為肆習、編譜太常樂。換言之，元代的太常樂師，係以東平為主要的根據地。

筆者以為，因為元代的禮樂制度承襲於金代，且相關樂譜、樂師均長期由東平掌控。故，元代掌理禮樂的禮部、太常寺等官職，常由東平士人擔任，以便於擬定、指導相關政策，如忽必烈尚未即位前，即命宋子貞等人於東平督視樂師肆習；元初，東平李昶、徐世隆、張孔孫等人，都曾任禮部尚書或太常卿等職。甚至，東平士人群聚的翰林國史院，亦常參與制定禮樂之制，如負責編撰樂章等。¹⁵¹簡言之，金代的宮廷禮樂經由東平的收羅、保存之下，成為元代的宮廷禮樂。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七、結論

金末蒙興之際，屬於蒙古漢軍世侯之一的東平嚴氏，或出於耳濡目染，崇尚儒學，或為提升個人的聲望、地位，積極提倡學術，招納與培養士人，振興東平的學風。在嚴氏父子的經營之下，「四方聞義而來依者，館無虛日，故東平人物視他鎮為多」¹⁵²，東平的學風鼎盛，形成新興的東平學派，蘇天爵曾形容當時情況：「是時，齊魯人士踵金之詞賦餘習，以飾章繪句相高。」¹⁵³中統建元後，東平士人陸續入朝為官，受到重用，並以翰林國史院為中心，逐漸凝聚為一股政治勢力。

¹⁴⁹ 明·宋濂，《元史》，卷 68，〈禮樂二〉，頁 1691-1692。

¹⁵⁰ 明·宋濂，《元史》，卷 68，〈禮樂二〉，頁 1692。

¹⁵¹ 明·宋濂，《元史》，卷 68，〈禮樂二〉，頁 1697-1698。

¹⁵²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 10，〈平章宋公傳〉，頁 200。

¹⁵³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 7，〈耶律文正公神道碑銘〉，頁 101-106。

這些嫻熟於吏事的東平士人陸續進用於朝，參與擘畫各項品條格式、選舉禮文等典章政事，影響元代政治典章的取向，如官制主要承襲於金，而且強調吏的作用，增加吏對於官的影響力等，咸信是受包含東平士人在內的金源遺士影響。

東平學派的學風，受到地域、人才等因素影響，士人大都來自於河北、山東，甚至於東平本地儒者，為數不少。其中，多數東平士人為前金遺士，即金源遺士，他們既善於詩詞文賦，擁有豐富的文學造詣；又因具有進士出身的背景，在金代以進士充吏的制度下，幹練治世之道，長於吏治。簡言之，東平學派具有三項特色，一為承襲金源文化，二為人才大都來自於華北，三為善於吏治之學。

雖然，東平學派承襲於金源文化，可以歸類為北方的學術；魯齋學派奉程、朱之說為圭臬，傳承於宋代的學術，可以歸類為南方的學術。不過，筆者認為，兩派的立場差異，不論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呈現良性的競爭，並未因學術文化的歧見、南北地域的差異而不相交游，亦未產生所謂的黨同伐異、攻訐對方，或結黨營私的情況。實際上，兩派的士人交往熱絡，相互提拔之事，時有所聞。

承上述，東平學派或魯齋學派的區別，應該以學術文化的淵源或傳承為標準，而非以地域的差距、政治的立場等作為標準，如被歸為魯齋學派的劉因（1249-1293）¹⁵⁴係河北容城人，一生尊崇程、朱之學，遊歷與講學於各地。¹⁵⁵此因，雙方的士人，係藉由從游、從學等管道，相互影響，進而認同該派的學術文化、理念思想。這種認同並非絕對，而是模糊的。如前述的魯齋後學吳澄，任國子祭酒時雖以程、朱之學為尚，因欲雜揉陸學，遭非議去官。吳澄與許衡等人並無直接的師生、交游關係，所以在學術思想上歸類為魯齋學派，係吳澄崇尚程、朱之學之故。換言之，不論是東平學派或魯齋學派，雙方的區別並不明顯、不明確，而是模糊的，甚至隱性的。況且，對於學派之分，古人自己也常難以明確的分辨，如蘇天爵曾拜安熙為師，後又為虞集門生，故《儒林宗派》將蘇天爵歸為吳（即吳澄）氏學派¹⁵⁶與劉（即劉因）氏學派。¹⁵⁷至於，蘇天爵的學術思想，究

¹⁵⁴ 劉因（1249-1293），字夢驥、夢吉，號樵庵，又號雷溪真隱，容城（今河北容城縣）人。因喜諸葛亮「靜以修身」之語，乃表其所居曰「靜修」，世稱靜修先生。至元三十年（1293），卒，諡文靖。著《靜修集》、《丁亥集》等。

¹⁵⁵ 關於劉因的學術淵源，與魯齋學派之往來關係，可以參考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識份子與科舉〉，頁 636-679。

¹⁵⁶ 據《儒林宗派》，虞集屬吳澄學派，故蘇天爵可歸為吳氏學派之門生。清·萬斯同，《儒林宗派》，卷 13，〈元〉，頁 3 下-4 上。

竟偏向吳澄或劉因；兩位老師安熙或虞集，誰對蘇天爵的影響力較大，則是模糊難分，無明確的分界。

最後，東平學派在政治上經過元初的興盛後，人才逐漸凋零，影響力不如魯齋學派。在文化上，東平學派得以藉由士人間的交游、從學者的傳遞、政治的影響等，無形中將金源文化散佈、傳承至各地，甚至逐漸與其他文化思想融合。這種多元文化的融合，使得元代的文人間建立緊密的社會文化網絡，不但相互參與詩文、遊宴、書畫題跋、唱酬等活動，更成為傳遞學術文化的主要力量，形成一個士人文化圈。¹⁵⁸

附錄：東平士人一覽表

人名	籍貫	東平時期的職	入朝後最顯著的職務	備註
王玉汝（?-1255）	山東東平	東平行臺知事	無	
元好問（1190-1257）	山西秀容	東平行臺幕官	無	金興定五年進士
賈居貞	真定獲鹿	東平行臺從事	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李楨（1199-1258）	西夏人	東平行臺幕官	襄陽軍馬萬戶	
宋子貞（1189-1268）	山西長子	詳議官兼提舉學	平章政事	
商挺（1208-1288）	山東曹縣	東平行臺幕官	參知政事	
李世弼	山東東平	東平府學教授	無	金興定二年進士，李昶父
李昶（1202-1289）	山東東平	東平行臺知事	山東提刑按察使	金興定二年進士，李世弼子
劉肅（1187-1263）	河北威縣	東平行臺經歷	右三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	金興定二年進士
徐世隆	河南西華	東平行臺幕官	淮東道按察使	金正大四年進士
張昉（?-1274?）	山東汶上	東平行臺知事	兵刑部尚書	
張澄	河北威縣	東平行臺參議	無	張孔孫父
張孔孫	河北威縣	東平行臺議事	翰林學士承旨、參議中書省	張澄子
康曄	山東高唐	東平府學教官	無	
張特立（1178-1253）	山東東明	東平府學教官	無	金泰和三年進士
王磐（1202-1293）	河北永年	東平府學教官	翰林學士	金正大四年進士

¹⁵⁷ 據《儒林宗派》，安熙為劉因門生烏叔備之門生，故蘇天爵可歸為劉氏學派之門生。清·萬斯同，《儒林宗派》，卷13，〈元〉，頁6下-7上。

¹⁵⁸ 蕭啟慶師，〈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初探〉，《元朝史新論》，頁203-242。原刊於《第二屆宋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1996），頁165-190。

李謙 (1231-1310)	山東東阿	東平府學教官	翰林學士	
孟祺 (1241-1291)	安徽宿州	東平行臺書記	嘉興路總管	
閻復 (1236-1312)	山東高唐	東平行臺書記	翰林學士	
王構 (1245-1310)	山東東平	東平行臺書記	濟南路總管、參議中書省	
李之紹	山東平陰	東平府學教官	翰林直學士	
申屠致遠 (?)	山東東平	東平府學教官	監察御史	
曹伯啟	安徽揚州	東平府學學生	西臺中丞	
夾谷之奇 (?)	女真人	東平府學學生	吏部尚書	
徐琰	山東東平	東平府學教官	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吳衍	不詳	東平府學學生	南臺中丞	
馬紹 (?-1300)	山東金鄉	東平府學學生	江浙行省右丞	
樂玉	河南盟津	東平行臺勸農	無	樂翔父
樂翔	河南盟津	東平行臺廣備	無	樂之昂父
樂之昂	河南盟津	東平府學學生	某路推官	樂翔子
孫德謙	不詳	東平府學學生	無	據《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下
杜仁杰	山東濟南	東平行臺幕官	無	據《全元散曲》
楊桓 (1233-1299)	山東兗州	東平府學學生	國子司業	
高文秀	山東東平	東平府學學生	無	據《全元散曲》
張時起	山東東平	東平府學學生	無	據《全元散曲》
顧仲清	山東東平	東平府學學生	無	據《全元散曲》
賈起	山東東平	東平行臺倉提	不詳	

註：備註欄內，除特別標註出處者外，其餘已於前頁註釋標註出處者，不另標註。

籍貫欄係以今日地名為標註。

八、徵引書目

(一)史籍文獻、地方志（依著書年代先後、作者筆劃繁簡為序排列）：

金·元好問，《遺山集》，《叢書集成三編》第38冊，台北：新文豐出版，1996。

金·楊奐，《還山遺稿》，《叢書集成續編》第133冊，台北：新文豐出版，1988。

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1965。

- 元·王旭，《蘭軒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202冊，1983。
- 元·元明善，《清河集》，《叢書集成續編》第133冊，台北：新文豐出版，1988。
- 元·姚遂，《牧庵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1965。
- 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96冊，1983。
- 元·俞希魯，《至順鎮江志》，台北：成文出版，1975。
-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收入《叢書集成新編》第65冊，台北：新文豐出版，1985。
- 元·郝經，《陵川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96冊，1983。
- 元·陸文圭，《牆東類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94冊，1983。
-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叢書集成續編》第12冊，台北：新文豐出版，1988。
- 元·程鉅夫，《雪樓集》，《叢書集成續編》第135冊，台北：新文豐出版，1988。
- 元·脫脫，《金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5。
- 元·張鉉，《至正金陵新志》，台北：大化書局，1983。
- 元·楊弘道，《小亨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98冊，1983。
-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94冊，1983。
- 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
-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宋濂，《元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明·李賢，《大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台北：新興書局，1975。
- 明·馮從吾，《元儒考略》，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247冊，台北：新文豐出版，1988。
- 清·沈翼機，《乾隆浙江通志》，台北：華文書局，中國省志彙編據清乾隆元年刊本影印，1967。

- 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收入《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第一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十七年刊本影印，2003。
- 清·畢沅、阮元，《山左金石志》，收入《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第一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清嘉慶二年刊本影印，2003。
- 清·萬斯同，《儒林宗派》，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15冊，台北：新文豐出版，1988。
- 民·李經野，《民國曲阜縣志》，台北：成文書局，據民國二十三年刊本影印，1968。

(二)研究論著（依作者筆劃繁簡為序排列）：

- 許凡，《元代吏制研究》，北京：新華書店，1987年。
- 袁冀，《元史論叢》，台北：聯經出版，1978年。
- 隋樹森，《全元散曲》，台北：漢京出版，1983，四部刊要本。
- 薛瑞兆，《金代科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三)期刊論文（依作者筆劃繁簡為序排列）：

- 安部健夫，〈元代的知識份子和科舉〉，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
- 門巋，〈元初“世侯文化”的特點及其對元代文學的影響〉，東南大學學報編輯部編《東南大學學報》（南京，2004），第6卷第2期。
- 孟繁清，〈社會變革與文化人的歷史抉擇〉，收入氏著《金元時期的燕趙文化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 孟繁清，〈金代的令史制度〉，收入氏著《金元時期的燕趙文化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 姚從吾，〈金元之際孔元措與《孔教》在蒙古新朝的繼續〉，收入氏著《姚從吾先生全集》第7冊，台北：正中書局，1982。
- 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元史論叢》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孫克寬，〈元初東平興學考〉，收入氏著《元代漢文化之活動》，台北：中華書局，1968。

- 孫克寬，〈元初儒學之淵源〉，收入氏著《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台北：文星出版社，1958年。
- 孫建平，〈趙復和太極書院對元代理學發展的促進〉，湖南大學學報編輯部編《湖南大學學報》（長沙，2005），第19卷第3期。
- 徐秉愉，〈金代女真進士科制度的建立及其對女真政權的影響〉，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編《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台北，2004）。
- 袁冀，〈東平嚴實幕府人物與興學初考〉，收入氏著《元史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6。
- 袁冀，〈元代之國子學〉，收入氏著《元史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6。
- 晏選軍，〈嚴實父子與金元之交的東平文化〉，收入《殷都學刊》2001年第4期。
- 常大群，〈元初東平府學的興盛及其原因〉，收入《齊魯學刊》2000年第6期。
- 陳高華，〈大蒙古國時期的東平嚴氏〉，《元史論叢》第六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 陳高華，〈金元二代的衍聖公〉，收入氏著《元史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
- 蕭啟慶師，〈忽必烈潛邸舊侶考〉，收入氏著《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豐，1983。
- 蕭啟慶師，〈大蒙古國的國子學-兼論蒙漢菁英涵化的濫觴與儒道勢力的消長〉，收入氏著《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出版，1994。
- 蕭啟慶師，〈元代幾個漢軍世家的仕宦與婚姻-元代統治菁英研究之二〉，收入《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出版，1994。
- 蕭啟慶師，〈大蒙古國時代衍聖公復爵考實〉，收入《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出版，1994。
- 蕭啟慶師，〈元朝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初探〉，收入氏著《元朝史新論》，台北：允晨出版，1999。
- 蕭啟慶師，〈元代科舉與菁英流動：以元統元年進士為中心〉，收入氏著《元朝史新論》，台北：允晨出版，1999。
- 蕭啟慶師，〈元代蒙古色目進士背景的分析〉，收入《漢學研究》（2000）第18卷第1期。
- 韓志遠，〈元好問在金元之際的政治活動〉，收入《元史論叢》第五輯，1994。

(四)英文論著

C.C.Hsiao, “Yen Shih”,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1200-1300)* (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 1993), pp60-73。

(五)工具書目

王德毅，《元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新文豐出版，1982。

洪金富師，《遼宋夏金元五朝日曆》，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2004。



Academy and influence of Dong-Pin in initial stage of Yuan Dynasty

Yang-da Fan*

Abstract

Between 1214-1260, falling into the unprecedented turbulence in the North of China,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s in turmoil, the people's life drift from place to place. At that time, went and seek refuge with the strong overlord with the tendency, give play to the chief of institute, the main channel that most scholars survive, so the wind of the person of travel around all parts prevails. These accommodate overlord of scholar are vassals of Han army in the North of China at that time, they got the Mongolian ruler to trust by assisting the work praised when invading in the North China of Mongolia, become one of the defensibly local military strength. Among them , Dong-Pin Yan who one of the vassals of army of Mongol build up with the acrobatic skill but pay attention to the style of study of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 train talents actively at the time of covering with and revitalizing in the latter stage of Jin Dynasty (1115-1234) ,solicit the Confucian scholar, extends the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Dong-Pin Yan reserve culture, revitalizing the action of academy, making the Dong-Pin becomes the academic important strategic place of North China of the beginning gradually. In the beginning of Yuan Dynasty and come from taxi people and open up and begin to show ability politically gradually, get the imperial court to put in an position is so-called the academic wing of Dong-Pin in the group, In addition Dong-Pin scholar is it for first force, form the what is called in the school to condense also on academy.

Keywords: Yuan Dynasty, Dong-Pin, Academy, culture, education, Confucian scholar, Yen Shih

* Doctoral Course,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